

周恩來同志與新華社記者談話

國共談判迄今無結果，根本障礙在國民黨

固執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八月十二日——

新華社記者在讀了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社英文稿所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所談關於政府與中共間談判的問題後，特於十二日走訪周總來同志，詢其對梁部長談話的意見，承其答覆如下：

（一）梁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國共關係已有改進，並將繼續改進」。如果說去年十月國民黨宣佈了政治解決的方針而沒有進行談判，現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去蘇

周恩來同志與新華社記者談話

以後才開始了談判的話，這樣說，關係是比以前有了一點微小的改進。可是，梁先生又說：「談判了三個月之後，國共問題已經有了一部分解決了」。我可以負責聲明，任何一個具體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舉例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渝延間面延間電台通信，釋放各地被捕人員，停止在報紙上對中共造謠污蔑的言論等事，都未見有任何解決，更不用說停止封鎖邊區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等事了。

（二）梁先生認為：「根本解決問題困難很多」，又說：「政府的觀點和共產黨的觀點事實上並無嚴重分歧」。這完全是一種給國內外關心兩黨談判人士一種錯覺的說法。實際，雙方在解決問題的原則上，有着很大的距離。我們從西安事變以來，即不斷向國民黨建議，只有立即實行民主，才能增強團結抗戰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徑，才能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與解決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我們擁護統一，是擁護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我們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要求他堅決抗戰與真正實行三民主義。這不僅是共產黨一黨的要求，而且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廣大人民的要求。但是國民黨統治人士與政府的觀點，則完全兩樣，他們始終不願意立即實行民主，至今仍

堅持國民黨的一黨統治與限制、削弱和消滅異己的方針，用一種自大和武斷的精神，只強調別人應無條件的擁護政府，擁護統一，而不許問這種統一是否對抗戰民主團結有利。這就是現時雙方談判所以相距甚遠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認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是在於中共黨人一方面宣稱他們有意合作，但事實不然，他們所作的事情和他們的說話相反」。梁先生此話完全與事實相反。國民黨所希望於中共的，是實行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所宣佈的四項諾言。七年來，我們已經切實的實行了，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這是有充分事實可以證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說中，已經詳細的說到了這點。但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究竟在那裏呢？一句話，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而不願立即實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以保證戰後和平，這就是解決問題的障礙所在。

（四）梁先生所說的過去三個月政府和中共的談判經過，也與事實大有出入。林伯

渠同志五月二日到西安後，等與王世杰、張治中兩先生作初步商談。林提議以我在三月十二日演說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國實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徑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問題爲商談的根據，張王不願。張王主張先就兩黨目前有關的軍事及邊區問題商談。對於編軍數目，林提出現程分散在各敵後游擊區的正規軍四十七萬七千多人，都是久經對日作戰有成績的部隊，請政府立即予以編整。爲了使問題容易解決，請先給以六個軍十八個師的番號，但張王只主張編四個軍十二個師。關於邊區問題，張王主張改爲陝北行政區，直隸行政院，實行中央法令，林提出區域及現行民主制度不變，實行三民主義。關於黨的問題，林要求須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止審判，開放言論。關於敵後游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但一切都應按有利抗戰的原則來解決。關於撤除邊區軍事經濟封鎖問題，服王允先對於商業交通予以便利等等。西安談話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林與張王最後一次會談時，商定將歷次會談雙方意見整理成記錄，雙方簽字，各報告其中央以備參考，然後由兩黨中央作最後決定，這個意思已在記錄上註明了。林就在這個記錄上首先簽字，但張王未簽。記錄既係綜合雙方

談話的意見而成，顯非林之一方意見，且又未經雙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為預備協定，這是稍具常識的人都能明瞭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圖指鹿為馬，混淆聽聞，實在令人遺憾。

（五）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志偕張王兩先生飛往重慶。二十一日，我黨中央即有覆示給林伯渠同志，囑其向國民黨中央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其中主要內容，關於全國政治制度者三條：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實行名符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者十七條：關於編軍，為委曲求全計，請政府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並給以給養軍火醫藥等接濟。關於地方政府，請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民選政府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關於封鎖和進攻我軍問題，請政府撤消對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停止對敵後我軍的軍事

進攻。關於盟國援助問題，請政府對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金錢，應按正當比例分配於十八集團軍及游擊軍。此外，尚有請政府通令取消「奸黨」「奸軍」「奸區」等誣蔑與侮辱中共、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各抗日根據地的稱號，停止特務人員對中共、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各抗日根據地的破壞活動，停止在報紙上對中共的造謠，釋放各地被捕人員，停止對新華日報無理檢查，恢復重慶西安兩辦事處電台，允許兩辦事處工作人員有往來滬延間、西延間的自由及在該兩地居住與購買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該提案於五月二十二日送交張王，張王以條文如此寫法，無異暴露國民黨之罪狀，拒絕轉呈政府。林爲尊重張王意見，轉報我黨中央請示。旋由我黨中央覆示，在文件上只寫關於全國民主政治及編軍、停戰、停封鎖等十二條，而把請求政府停止特務反共破壞活動等八條改爲口頭要求，於六月五日送交張王。張王亦於同一時間將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轉告我黨中央。但張王仍拒絕向政府轉呈我黨提案，嗣經多日爭執，張王始於六月十五日覆函稱，已將我黨提案轉呈政府。按雙方提案實有極大距離，在政府提示案中，一、關於我方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合法，釋放愛國政治犯，釋放葉挺

等被捕人員，撤消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停止軍事進攻，按比例分配盟國援華物資，停止特務活動，停止造謠污蔑，恢復電台通訊，停止無理檢查報紙，允許豫、西兩辦事處工作人員有走路自由及購買生活物品自由等項，一字不提；二、編軍數目，只承認四個軍十個師，且不顧抗戰需要及敵後游擊戰爭環境，要將十個師以外的數十萬軍隊，「限期取消」，並要將十個師「限期集中使用」；三、對邊區政府只要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實行三民主義，不承認爲抗日所需要並且已經實行大見成效的現行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四、對各抗日根據地人民選舉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還久已離開該地不知何往的所謂「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據地爲着抗日需要而發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紙幣。

由於兩黨意見距離甚遠，我黨中央曾邀請張王兩先生來延委商談。林伯渠同志要求國廷安報告談判經過，以便我黨中央根據其報告，對於政府提案作正式之答覆，張王則稱現正在請示中。三個月的談判經過，就是如此。而梁先生竟謂：「中共並未回答政府條件，反而提出十七條對案，經過修改後改爲十二條，這些條件和三個月前在西安談

判所同意的有關著不同」。這完全不合事實。事實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絕接受，我方爲委曲求全計，將提案五十條改爲書面十二條、口頭八條，於六月五日交付張王，彼方提示案亦於同時交付林伯渠同志，並且我們已屢次表示政府提示案與我黨意見相差甚遠。且我黨第一次提案是三十條，非十七條，後分爲書面口頭兩部分，乃是我黨中央爲委曲求全而這樣做的，並非「回答政府條件」。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實，用意何在，殊屬費解。

（六）梁先生最後說：「目前正在處於泯除蔣委員長條件和共產黨的對案之間的分歧」。我黨也希望其能很快的泯除這種分歧。梁先生再三聲言，肯定中國不會再有內戰，這是我黨所不歡迎的。但可惜目前事實，尙與梁先生所談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陝甘邊境周圍，即使在最近數月，亦尙有零星的不安情形。

二、在華北，自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閻錫山的第六十一軍即取得敵我同意，最後更訂了協定，從汾西地區渡過汾河，侵佔汾東地區，向我決死隊、八路軍大舉進攻，直擊現在，還未停止。

三、在華中，國民黨李品仙部隊最近仍不斷向我鄂中、皖中、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部隊進攻，而這些部隊正爲牽制敵人向我平漢、粵漢兩路進攻而戰鬥着。鄂中根據地最近正因營救了兩個美國飛行人員得到了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的謝函。

四、在華南，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今年曾先後救出六個美國飛行人員，可是這個區域的東江游擊縱隊，於五月間，又受到國民黨軍隊羅慰勤部兩千餘人的進攻。

這些就是軍事衝突並未停止，內戰危機並未過去的證據。

總之，依照目前形勢，要最後戰勝日本強盜，國共兩黨必須團結，國共之間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這種解決，只有國民黨的統治人士立即放棄一黨獨裁政治，立即放棄削弱與消滅異己的方針，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並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才能得到效果。我們共產黨人，是以十分熱烈的心情期待着這些的。